

上海发展“五型经济”的总体 思路和重大举措

高骞 史晓琛 黄佳金 钟灵啸 王培力¹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0003)

【摘要】 上海应充分发挥数字化的牵引作用，加快企业、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形态更趋创新、开放、流量化，服务能级、总部能级更趋提升。一要强化数字化思维。研究新时代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指标，用数字化理念引领企业战略、组织、流程、业务等全面转型，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方面形成加速效应。二要突出数字化赋能。在数字治理方面加快步伐，构建开放的数字生态，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赋能各行各业的能力。

【关键词】 五型经济 数字化转型 流量型经济 总部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2)08-0057-007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数字、智能为特征的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我国经济进入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攻关期，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大国博弈和全球竞争的焦点，各大城市围绕核心节点城市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大力发展“五型经济”、优化经济发展布局，无疑是上海遵循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规律，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不断巩固和增创战略新优势的主动作为，更是顺应国内外变化趋势，充分发挥经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一、“五型经济”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围绕经济发展格局，上海提出包括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和流量型经济的新业态结构，首次将五种形态的经济集成起来，具有重要而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五型经济”的提出，是与上海整体发展战略谋划一脉相承的，点明了上海高质量发展和“两个面向”的发展导向，突出体现了完善“两个循环”发展格局、打好“五张王牌”的重要布局，为全力强化“四大功能”和建设更高能级的“五个中心”夯实基础。

(一) “五型经济”的内涵

“五型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分类方式，这种经济分类方式适应产业变革和价值链变动新趋势，围绕追求头部价值和产业链高端的核心取向，坚持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强化总部高度集中的能级优势，以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要素流动，以流动创造价值，体现了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经济特征。

¹**作者简介**：高骞，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处处长。史晓琛，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处处长。黄佳金，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钟灵啸，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王培力，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从发展导向看，“五型经济”更重视新的业态结构。对于经济的认识和分类，“五型经济”不同于传统的产业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市场主体结构等分类方式，而是新业态结构。以新业态结构为视角的经济分类方式不纠结于二三产业比重，不强调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下的产业比例，专注于从经济形态出发，重视城市经济核心功能的提升，不断完善经济发展格局。这是对经济发展认知和理念的创新，提出了认识经济的新角度，有助于避免传统行业划分中产业链、价值链背离、无法准确识别经济形态的现象。以往部分身处高技术行业却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难以从传统国民经济统计中区分出来，而一些传统行业中的创新环节，却被隐没在低技术行业中。只有跳出传统认知，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认识都市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发展路径看，“五型经济”更体现国际大都市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脉络。“五型经济”从不同侧面勾勒出上海经济的长板、优势和特色，其内容不都是新的，其集成起来论述却是首创，表明了上海经济发展有取有舍，发展理念从“补短板”到“锻长板”，“锻长板”的重要性优于“补短板”。这一重点发展的思路符合国际特大城市的资源禀赋和优势，有助于构建高端化、专业化的价值链服务体系和塑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从政策意义看，“五型经济”更强调产业链的整体生态营造。“五型经济”难以像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那样进行统计，却更易于制定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政策。促进“五型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要精准研究增长机理，围绕产业链量身定制扶持政策和制度供给。“五型经济”的提出破除传统思维束缚，从上海具有优势的经济业态出发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引导和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再是针对具体产业出台政策，而是根据“五型经济”中各型经济的发展机理、业态特征和营商环境需求，完善全产业链的制度供给。例如，对创新型经济的支持政策，适用于进行创新的各类行业及企业，而不再区分所处行业是高新技术还是传统产业。

（二）“五型经济”的主要特征

“五型经济”具有“三性一化”的鲜明特征。

一是在产业发展上具有融合性。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产业、行业分类边界日益模糊，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诞生出企业新供给模式、消费者新需求模式和经济新增长模式，使得“五型经济”之间具有相互交织、融会贯通的特点，多种经济形态常常在同一个企业中并存。

二是在空间布局上强调协同性。“五型经济”企业不局限于上海市场、上海区域来发展业务，往往企业总部、不同功能环节、各个分支机构布局在不同区域，需要国内外市场联动，通过要素的高能级辐射和配置，实现多地业务的协同。

三是在经济能级上体现高位性。“五型经济”企业具有较高的能级，从产业链看，创新型经济是创新策源功能的主体，占据产业链高端，辐射产业链各环节。从资源配置上看，总部型经济以产业控制力和影响力管控价值链，流量型经济构建大规模、多类型的价值链通道，分别构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主体和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从功能上看，服务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通过内外开放，扩大辐射范围、赋能各类经济主体，引导价值链。

四是在技术应用上突出数字化。“五型经济”促使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深度研发和广泛应用。创新型经济让基础信息技术实现新的突破，流量型经济以数字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开放型经济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总部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对传统业务进行重新定义，推动业务自动化、智能化。

（三）“五型经济”的关键支撑

“五型经济”主要依赖于三方面因素支撑。

一是新型要素的开发。发展“五型经济”除需要人才、土地、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高效供给，同时对新型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提出要求。主要有：数据资源，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也包括数据使用标准、交易平台和共享机制，以及相关的算力体系。知识产权，各类著作、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运营包括定价、交易、融资等。

二是开放包容的制度供给。发展“五型经济”需要有系统的制度供给，进行以规则、标准为重点的制度性开放，包括以制度性开放为特征的多层次营商环境，如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透明和稳定的政策预期，能促进企业投资发展的制度体系，对接国际标准的规则体系等；需要审慎宽容的新业态监管模式，从制度上保障和鼓励企业勇于创新、先行先试。

三是多元化的网络协作。发展“五型经济”需要多主体参与和跨区域联通的多元化协作网络支撑，包括以龙头企业、总部机构为引领的企业网络，发挥龙头企业、总部机构在产业链中的带动力和控制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产业链做好供应链，围绕产业链强化服务链；多元参与的创新联盟，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企业创新联盟；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协作网络，如区域一体化的城市数字共同体，促进优秀场景与应用的共建共享共用，也包括跨区域公共服务联合体，支持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

二、上海发展“五型经济”的瓶颈约束

上海进一步推动“五型经济”发展，依然面临制度、生态和新型生产要素等方面的制约和瓶颈。

（一）“五型经济”的统计标准还不明确

“五型经济”是代表着全球都市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形态，具有功能融合、形态复合、业态交叉的特点。现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具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无法沿用现有的统计分类办法对“五型经济”进行测度评价，导致“五型经济”只能停留在一般概念区分上，需进一步加快探索和明确相关统计标准。

（二）适应“五型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待加强

一是针对性支持政策的力度有待完善。“五型经济”的发展需要更为系统集成综合施策，以适应资源整合、跨界融合的内在要求。目前跨部门、集成式的政策支持还不足，要加快探索，更好地惠及“五型经济”市场主体和经济活动。二是开放型政策设计有待深化。过去对外开放更多采用阶段性政策，围绕吸引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等目标，设计出外商投资促进、出口退税等政策并取得良好成效，但从制度性安排角度看，尽管已实施《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但在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上还有一定难度，影响了部分贸易型跨国公司的功能拓展。

（三）数据、频率等新型要素的高效供给和配置面临堵点

一是数据流动和开发不够。上海的数据治理能力还有待提升，数据的共享和开发应用缺乏标准，跨境数据流动存在障碍，影响要素价值挖掘。二是知识产权、技术等市场化运营不足。与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相比，上海的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商业化水平较低，知识产权、技术等动产的确权定价、交易、抵押、融资等尚未形成成熟模式，跨境技术交易受到外汇管制。三是频谱资源需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特别是无人车间、无人工厂的发展，对频谱资源提出大量应用需求。由于频谱资源主要依靠行政支配，一些长期闲置、利用效率不高的频谱资源缺乏回收再利用，加剧资源短缺，无法满足企业、行业发展所需。

（四）支撑“五型经济”发展的新基建需加快建设

一是中小企业获取应用场景缺乏通道。产业应用场景作为推动产业爆发的新生态载体、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试验空间，对“五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当前，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布局落地形成一批应用场景，但应用场景开放的供需对接机制尚未形成，广大中小企业无法参与政府、行业和大企业的场景开发。二是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数据权属权益问题不明确，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平台企业、总部机构等对数据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难以落地，影响了流量型经济、总部型经济辐射能级与控制能力的提升。三是通用型基础设施亟需提速。比如，上海的通航产业基础薄弱且分散，市域面积紧凑、空域受限，早先注册在上海的整机企业纷纷落户外省市。而苏浙皖三省都已布局通航机场，积极承接上海溢出效应，扶持通航产业发展。

（五）包容审慎高效的监管环境有待创新

一是注册、用工、土地等监管审批规则无法匹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求。例如，大型连锁食品企业新开网点仍要逐个申请许可证；公众号博主、快递、代驾等就业形式需要较为灵活的用工和社保缴纳方式；部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新经济企业希望土地可以混合使用等。这些都将作为下一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二是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亟待建立。“五型经济”企业业务往往涉及多个业务部门的监管，围绕多类别监管，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跨业态、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信用、政务服务数据中心，以满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监管需求。三是社会化监管力量参与不深。来自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监管合力不够强，如面对职能部门制定涉及行业利益的规章制度、行政措施、技术标准时，行业协会、第三方资源、专家学者等参与监管、辅助决策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六）“五型经济”发展中各主体关系协同度还不高

一是错位发展中竞争意识大于竞合意识。上海各区招商政策互相攀比，存量企业总部的同质化、非良性竞争趋势显现，企业普遍利用各区税收优惠、奖励办法和资源禀赋等差异，实行企业注册和经营跨区分离。二是企业间梯度合作的生态尚未形成。大中小企业生态网络不健全，合作机制尚未理顺。大中小企业普遍自建研究院、实验室等基础设施，造成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初创和小微企业则面临应用场景缺失的发展瓶颈。三是政企社互动关系有待调整。重大产业投资中，财政投入、国资收益投入、企业自主投入组合模式待优化；部分产业园区和孵化器“房东”角色明显，产业链连接、产业集群整合功能较弱；行业龙头企业充当产业联盟、行业协会角色，混淆科技创新与产业引领功能，不公平竞争趋势显现。

三、上海发展“五型经济”的总体思路

（一）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强化“五型经济”发展新动力

着眼经济发展规律，拓宽思路，充分发挥数字化的牵引作用，加快企业、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形态更趋创新、开放、流量化，服务能级、总部能级更趋提升。一要强化数字化思维。研究新时代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指标，用数字化理念引领企业战略、组织、流程、业务等全面转型，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方面形成加速效应。二要突出数字化赋能。在数字治理方面加快步伐，构建开放的数字生态，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赋能各行各业的能力。

（二）以优化供给为核心，夯实“五型经济”发展新支撑

抓住新要素、新制度、新通道等核心供给，锻造上海的突出优势，强化竞争优势，形成“五型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力争实现“三个突破”：一是在新要素供给上有所突破。积极赋能增值传统要素，着力解决人才短缺、人才吸引力下降、新型用工矛盾凸显等问题，加快突破对创新型资本的支持，挖掘释放新型要素，尤其是在探索市场化配置新型要素，提高供给效率上加快步伐。二是在新制度供给上有所创新。加快探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制度安排，推动一系列首创性、引领性改革开放事项落地。积极适应“五型经济”发展需求，围绕新业态、新经济发展特点和需求，加快探索更灵活、更透明的审慎包容监管。三是在新通道供给上有所拓展。放大通江达海的优势，在信息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更高水

平的国际运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逐步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为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跨域流动提供更高效率的通道。

(三)以需求创造为突破，激发汇集“五型经济”发展新活力

扩大需求，以需求创造流量、强化服务、促进创新和开放，激发“五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聚焦三个“做强”：一是“做强应用促需求”，充分发挥上海拥有海量应用场景和人工智能平台的优势，推动更多开放共享，加快推进基于各类应用场景的供需对接和产业创新。二是“做强品牌促需求”，在高端消费领域、功能型服务领域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优势，尤其是着重提高功能型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包括金融要素市场服务、专业服务等，也包括现代供应链、科技服务等新型服务中的高精尖领域。三是“做强枢纽促需求”，鼓励支持企业加快拓展国际化发展，打造“立足上海、联通全球”的枢纽功能，打造长三角甚至是全国本土企业出海的重要节点码头。

(四)以协作网络为依托，拓展“五型经济”发展新空间

发展“五型经济”要打破常规，不局限于一企一业和一地一区，着力推动形成聚合效应，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要立足于“两个着眼”：一是着眼于促进各类企业、政企之间大协作。探索模式创新，探寻央地、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处理好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新经济发展领域，既要积极培育本土头部企业，更要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带动力，强化公平竞争，促进协作，以企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支持建立企业创新联盟。二是着眼于构建各区、市内外之间大网络、大平台。既要发挥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等重点区域的引领作用，也要着力统筹协调全市资源尤其是平衡协调各区资源，积极布局“五个新城”，建立一盘棋、大平台的“五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推动构建新型区域治理体系，强化对内对外网络链接，为“五型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舞台。

四、上海发展“五型经济”的重大举措建议

(一)加快完善适应“五型经济”的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和监管体系

针对“五型经济”企业的发展需求，力争在一些重点关注问题上加快突破。一是积极探索“五型经济”的识别、认定和评价体系。加快研究“五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统计，廓清对“五型经济”认知的差异，建议从产值结构、投入产出效率、创新成效、开放质量、服务能级、流量规模等从可测度指标着眼，构建“五型经济”企业甄别和认定标准，充分发挥科学统计在上海新发展阶段的“风向标”和“导航仪”作用。二是为“五型经济”企业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总部、成长性创新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探索政策体系的精准识别、精准推送、精准扶持和精准服务，加大对惠企政策的靶向识别和精准推送。三是着力完善“五型经济”发展的监管环境。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建立违反公平竞争问题反映和举报绿色通道，关注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妨碍新机构进入等新问题。深化市区两级免罚清单制度，积极推广容缺受理、住所登记信用承诺等试点，加强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建设，支持建立企业自我纠错的信用修复机制。

(二)加强新型要素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综合利用

新型要素的供给不在于数量投入的多寡，主要在配置效率的提高，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新型要素的配置效率。一是积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逐步完善数据采集应用、数据确权等领域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全市集中管理、统一发布、动态更新、共享使用的数据资源目录体系，探索建设社会公有流量开放平台。加强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的标准化制度设计，实行新兴业态和非标准化业务等特殊数据的灵活采集，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交易机制创新，推进更广泛的数据开放共享和交易流动。二是加快探索频率资源市场化配置。以提高频率利用效率为方向，推动频谱使用科学评估和回收利用，建立闭环管理机制。探索有针对性的频率分配方案，支持共享汽车、芯片制造、高端装备等领域智能生产的发展需求，提高频率供给精准性。鼓励认知无线电、动态频谱共享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频率分配由独享向共享转变。三是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

营。大力发展地方性的专利、商标、软著等动产金融和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的定价、登记和质押融资机制，开展创业保险和专利保险等试点，促进技术与资本融合。建立重点行业的中外知识产权公共数据库，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培育一批深耕专利市场的服务机构，积极拓宽专利供需对接渠道，有效唤醒具有市场价值的“沉睡专利”。针对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设立专项孵化基金，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范围，降低知识产权证券化门槛，增强对长三角创新者、投资者的吸引力。

(三)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有效落地

围绕数字化转型的总体目标，以搭建数字化应用场景供需有效对接平台为抓手，向各类企业开放创新机会，支持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迭代升级、示范应用。一是建立场景供需信息征集、评估、筛选和发布机制。按照“需求导向、高频使用、应用为主”的原则，依托“企业服务云”平台、行业协会、场景沙龙等渠道，面向供给侧搭建交流平台，集专家智慧、聚人民力量，鼓励更多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二是积极支持应用场景验证。设立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场景创新专项资金，鼓励企业组建可提供商业模式验证的创新应用实验室开展场景实测，支持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构建细分领域的企业级应用，培育一批示范性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对具有集中度、显示度的专业化场景运营机构，可给予一定奖励。

(四)进一步强化上海品牌竞争优势

紧扣品牌创建培育、标准认证、宣传推广等环节，进一步推动上海品牌成为优质产品、高端服务、行业标杆的代名词。一是打造一批首发经济示范区和新品发布地标性载体。围绕文旅休闲、健康养老、信息等上海具备发展优势的细分行业，培育壮大一批知晓度广、信誉度高的本土品牌，打造一批首发经济示范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二是探索在政府采购、货物通关等方面，将“上海品牌”认证列为加分项。推动长三角地区高端品质认证合作联动，形成专家互派、结果采信等工作机制。加强认证监管，创新监管方式，健全完善退出机制。三是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制定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标准。提高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辐射能力，助推上海在重要领域确立全球标准、争夺话语权，形成更多的“上海标准”。

(五)超前布局新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面向未来、具有撬动引领作用的新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和抓手，为“五型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是集成发展新一代感知、网络、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以5G、千兆光纤、卫星互联网等建设为基础，围绕生产、生活、城市运行等需求，积极部署全域智能感知终端和感知网络，实现地面、地下、空中、水下立体覆盖。加快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持续推动电力物联网智能化改造，促进新旧基础设施的高效连接和转化，加快实现城市“物联、数联、智联”。二是打造服务全球数据汇集流通交换的高等级设施群和超算体系。加快临港国际枢纽性互联设施建设，持续提供通信容量，开通高速直连的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积极部署数字化领域的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统筹投资高性能计算资源，加快构建计算科学研究枢纽和高性能超算体系，积极打造高端低碳算力集群，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化集约化布局。面向金融、贸易、医疗、交通等数据密集型重点行业，大力推进行业性数据综合运营和交换中心建设。三是统筹推进跨区域、智能化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多网融合、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铁路货物能力，增强铁路服务市域及城市物流功能。加快推进国际中转集拼服务中心和浦东机场航空超级货站建设。推动一体化集配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快件仓储中心、分拨中心、转运中心等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拓展智能末端配送设施的投放范围。四是加快启动通航机场建设。打造区域通航网络重要节点，疏解枢纽机场公务机、国内航空快件运输等非核心业务，并加快在通航产业价值链高端布局，吸引国内外优秀企业来沪开拓通航新业务。加强与金山华东无人机基地等协作，支持智能航空产业发展。

(六)统筹“五型经济”多主体协作网络

统筹协调全市资源，促进各类企业、政企之间大协作，构建各区、市内外之间大网络、大平台，共同搭建“五型经济”发展

的大舞台。一是积极鼓励企业广泛协作。促进大中小企业织密合作网络，结合应用场景联合攻关形成良性互动“大生态”。支持大中型企业围绕自身需求开展创新大赛、开放应用场景，支持小微企业积极参赛。引导产业链各环节专业深化，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供给端鼓励共性平台服务，在需求端鼓励企业外包服务，探索共性平台使用费用和外包服务费用加计扣除试点。积极建立各类产业联盟，平衡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支持“五型经济”代表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鼓励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改进等工作。二是强化头部企业的带动作用。量身打造一批精准扶持政策，围绕头部企业规划建设高品质产业集聚区，为产业链中重点配套企业提供落户上海的绿色通道，帮助企业将附加值高的研发中心迁进总部区域，鼓励企业联合上下游供应商、经销商实现产业化、数字化发展，提升头部企业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支持有能力的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一起“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分支机构，开拓国际市场。三是推动共建“五型经济”大总部。针对上海各区总部布局不均衡、相互攀比招商政策现象，强化沪外增量企业的招商考核导向，推动各区根据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强协作，鼓励形成管理营运总部在中心城区、创新研发总部在新城、物流调度总部在郊区的多层次企业总部系统，吸引更多高能级多功能总部集聚上海。

参考文献:

[1]解放日报评论员. 聚焦“五型经济”增创竞争新优势[N]. 解放日报, 2020-10-12.

[2]黄铮. 发展“五型经济”上海正逢其时[N]. 联合时报, 2021-04-30.

[3]任声策. 新发展格局下上海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J]. 上海质量, 2021(6):11-16.

[4]江若尘, 陈昌东, 郑宇晨, 陈佳品. 上海流量型经济能级指数对标分析及发展思路[J]. 科学发展, 2022(5):48-56.

[5]张武晴. 上海构建国际一流总部经济生态圈的关键及建议[J]. 科学发展, 2020(7):16-22.

[6]刘宇. 我国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之上海思路[J]. 质量与认证, 2020(7):39-41.

[7]李峰, 向明勋, 陆丽萍, 梁绍连, 邱鸣华, 宋奇. 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切入口和发力点[J]. 科学发展, 2021(3):32-41.